

“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学解释*

金君达

【内容提要】 美国出现过两次针对共产主义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即“红色恐慌”，它本质上是一种由保守主义政客领导、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的、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要动员手段的社会运动。“恐慌”可能导致美国政府采取具有意识形态对抗和排外色彩的内外政策，研究“恐慌”形成机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作者结合政治过程理论等主流理论和案例特点，提出了适用于“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运动三要素模型，认为议题素材、运动领袖和运动听众是美国发起和维持反共社会运动的三要素，也是“恐慌”形成的先决条件。在两次“恐慌”中，运动领袖建构出外来威胁，并以此对社会进行动员，运动随着争议性剧目的爆发不断升级；在领袖失去政治声望后，运动则随之降温。将该模型应用于当前美国反华政治，可以看出美国尚未形成类似“恐慌”的排华运动，但拜登任内在野的共和党政客有动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对美国正在酝酿的反共运动应保持警惕。

【关键词】 社会运动；社会动员；意识形态；麦卡锡主义；政党政治

【作者简介】 金君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1)05-0131-24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意识形态斗争是一种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政治性运动。美国曾发生两次以“反共”为主要诉求的意识形态斗争(以下简称“反共运动”),两次运动均出现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最后导致出现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清洗。反共运动的高潮被称作“红色恐慌”(Red Scare,以下简称“恐慌”),其中第二次“恐慌”即“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日后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恐慌”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激烈形式,研究其形成机制对于预测当事国内政外交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亲历者穆瑞·列文(Murray B. Levin)将“恐慌”定义为“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即将在美国爆发而造成的全国范围反共狂热,人们害怕它可能改变教堂、家庭、婚姻、礼仪和其他美国生活方式”。^①第一次“恐慌”是1919—1920年美国司法与情报部门对劳工组织、左翼人士和俄裔移民的大规模审查,伴随的反共运动始于1919年年初的大罢工。第二次“恐慌”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1950—1954年对“苏联间谍”的大规模清洗,“麦卡锡主义”因此得名,^②伴随的反共运动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③的反共审查,持续至60年代的平权运动。“恐慌”是反共运动的子部分,其特征包括联邦政治机构主导的群体性恐慌(mass hysteria)、大规模政治审查和迫害、社会自发的排外暴力活动和检举等。

“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有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国内的反共运动极大限制了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政策选项。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联渗透论”的狂热宣传与认知导致美国决策层将社会主义新中国视为对立面。中国随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抗加剧。在美国,“恐慌”使大量左翼人士受到不公正调查,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即使在麦卡锡下台后,残留的反共思潮也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和反战运

^① Murray B. Levin, *Political Hysteria in America: The Democratic Capacity for Repres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29.

^② Robert Justin Goldstein, ed., *Little “Red Scares”: Anti-Communism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1–1946*, Oxford: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p.10.

^③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由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于1938年成立。戴斯属于民主党保守派,曾于1932年支持罗斯福新政,但在1937年后与罗斯福及执政的进步派决裂,与共和党保守派一同发起意识形态审查。在1945年戴斯卸任之前,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又被称为“戴斯委员会”,其调查对象主要是新政机构、劳工组织和其他左翼组织。“非美”即“不爱美国”、可能出卖美国之意。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是美国国会首个常设的专门调查“颠覆”活动的委员会。

动形成了阻碍。

近年来,美国政坛对华战略敌意上升,多名政学界人士公开警告“麦卡锡主义”可能重现。^① 美国是否会出现第三次“恐慌”? 反共运动在何时会升级为“恐慌”? 本文对20世纪美国两次反共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提出美国反共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和升级为“恐慌”的必要条件,并分析美国社会近期爆发“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

本文基于历史案例和社会运动理论构建了美国意识形态斗争三要素模型。通过对历史上两次“恐慌”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国的反共运动是其政客通过建构议题动员选民的过程。美国反共运动的形成需要三个要素,即议题、运动领袖和听众。三者的形成依赖以下过程:其一,国内政治斗争的特殊态势催生了试图通过反共运动夺权的政客,这些政客成为反共运动领袖。其二,运动领袖根据美国遇到的外部挑战建构出安全威胁。其三,社会矛盾为政客进行反共动员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 相关文献梳理

“恐慌”是反共运动持续升级的产物,对“恐慌”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反共运动全程。结合史实与相关理论,本文将反共运动定义为带有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美国学者已就反共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 政治学理论对“恐慌”案例的解释

在美国政治学中,社会排外思潮和排外运动被称为政治压迫(political suppression)或政治排外(political intolerance)。两次“恐慌”是政治压迫现象的重要案例。美国政治学界根据对“恐慌”的档案研究和理论分析,提出反共运动中政治压迫升级的四类成因。

第一类研究强调反共政客影响。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运用政治压迫模型研究两次“恐慌”,指出“恐慌”中的政治压迫都由精英而非群众发起。^② 反共运动

^①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历史学界被称为“第二次红色恐慌”,但“麦卡锡主义”一词知名度更高,因此更多地被中美政界和学界公开使用。本文探讨反共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在学术讨论中使用范围更加广泛的“恐慌”一词更为准确。各界人士对“麦卡锡主义”的警告参见《中国驻美大使:应坚决防止“麦卡锡主义”回潮》,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8/20/c_1126391614.htm,访问时间:2020年9月16日;包道格:《美对华政策须避免陷入“麦卡锡主义”》,载《环球时报》,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84058.shtml,访问时间:2021年1月19日。

^② James L. Gibson, “Political Intolerance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During the McCarthy Red Sca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Issue 2, 1988, pp.511-529.

的关键人物包括司法部部长亚历山大·帕默(Alexander Palmer)、^①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②参议员麦卡锡^③等人。安德鲁·伯特(Andrew Burt)指出,关键人物的演说对社会运动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两次“恐慌”都随着代表性人物声誉受损而快速衰落,可见政客个人对“恐慌”的维持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④ 基于精英个人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强调文化、个人性格等历史特定要素的作用,但也因此难以上升为普遍性理论。由于社会在叙事中往往被动地对焦点事件进行反映,此类研究容易忽略社会群众对反共运动的助推作用。

第二类研究强调苏联对美国反共运动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左翼活动家受到苏联共产主义运动鼓舞,对美国的斗争形势产生误判,在组织左翼运动方面过于激进,引起社会反弹。^⑤ 尼克·谢普利(Nick Shepley)认为,第一次“恐慌”源于美国工人运动分裂,马克思主义工会与排外的保守主义工会的斗争加剧了左翼与右翼的冲突。^⑥ 另一些研究认为对苏联的间谍活动^⑦(如“美亚事件”^⑧)是运动升级的关键。近年来,美国学者以苏联解密资料为依据,将反共运动的升级归咎于苏联。^⑨ 这些研究分析了反

① Nick Shepley, *Palmer Raids and the Red Scare(1918-1920): Justice and Liberty for All*, Luton: Andrews UK Ltd., 2011, p.54.

② Athan G. Theoharis and John Stuart Cox, *The Boss: J. Edgar Hoover and the American Inquisi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0.

③ David M. Oshinsky, *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

④ Andrew Burt, *American Hysteria: The Untold Story of Mass Political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Guilford: Lyons Press, 2015, pp.84-132.

⑤ Nick Shepley, *Palmer Raids and the Red Scare(1918-1920): Justice and Liberty for All*, pp.9-25.

⑥ 站在反共运动对立面的左翼人士成分比较复杂,包括美国工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社会福利的进步人士以及温和派政府雇员等。部分学者认为左翼人士为了令社会妥协进行激进暴力运动,反而引发保守民众反弹。此类研究参见 Todd J. Pfannestiel, *Rethinking the Red Scare: The Lusk Committee and New York's Crusade Against Radicalism, 1919-1923*, Florenc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p.121。

⑦ 指美国情报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国内苏联间谍活动尤其是非法情报收集活动的一系列调查。当时的联邦调查局等机关指责美国部分左翼组织是苏联的“间谍机构”,并在证据不确切、程序不正义的情况下大量提出指控,引发国内“红色恐慌”。参见 Robert Justin Goldstein, *American Blacklist: The Attorney General's List of Subversive Organization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8, p.8。

⑧ 指联邦调查局 1945 年年初对《美亚》杂志社的突击搜查,该案被认为是美国对苏联间谍调查的起源。由于罗斯福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谢伟思牵涉其中,该案经常被视作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分水岭,在中美关系研究中受到重视。参见张虹:《从泄密事件到政治工具——中美关系视角下的“美亚事件”研究》,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271—297、305 页;丁春砚、毕元辉:《〈美亚〉事件探析》,载《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89—92 页;Harvey Klehr 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 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p.1-225。

⑨ G. Edward White, *Alger Hiss's Looking-Glass Wars: The Covert Life of a Soviet Sp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80-152.

共运动的外因尤其是外国政策这一变量对反共运动的影响。但由于美苏意识形态斗争贯穿大半个世纪,此类研究无法解释为何其他时代的反共运动未升级为“恐慌”,如肯尼迪时代美苏对峙局势并未引发“麦卡锡式”迫害。

第三类研究认为反共运动是政治斗争的产物,^①具体而言是反共保守团体与进步团体的权力斗争。^②雷金·施密特(Regin Schmidt)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的厌战和排外思潮为保守派提供了政治机会;反劳工保守势力通过对外来威胁的宣传,煽动社会对共产主义“渗透”的担忧,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③兰登·斯托尔斯(Landon R. Y. Storrs)指出,“麦卡锡主义”的本质是两党保守派对民主党进步派即新政民主党人的政治颠覆。^④迈克尔·希尔(Michael J. Heale)认为,“麦卡锡主义”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与进步势力进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⑤部分研究将美国的两次反共运动与民权运动等国内政治斗争相联系,将政治迫害归因于美国国内保守派与进步主义、主流白人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斗争。^⑥基于政治斗争的研究跳出两次“恐慌”分析反共运动的全程,对于探讨运动的发展方向意义重大。但政治斗争是美国社会的“常量”,政治机会的出现则是关键自变量。此类研究对政治机会的分析往往受限于特定历史环境和个案,在建构理论方面有一定局限。

第四类研究则认为反共运动来源于美国政治系统的结构性缺陷,该类研究包括不同方向。一些研究着眼于美国历史,例如杰夫·伍兹(Jeff Woods)认为南方白人对“外国激进势力”的仇恨源于奴隶主对“奴隶造反阴谋”的恐惧,因此南方各州的“恐慌”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相互激使运动升级。^⑦另一些研究认为一些社会变量影响社会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例如詹姆斯·戴维斯(James A. Davis)通过比较不

① Michael J. Heale, *McCarthy's Americans: Red Scare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1935-1965*,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pp.1-60.

② Ernest Freeberg, "After the Red Scare: Civil Liberties in the Era of Harding and Coolidge," in Robert Justin Goldstein, ed., *Little "Red Scares": Anti-Communism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1-1946*, pp.1-29.

③ Regin Schmidt, *Red Scare: FBI and the Origins of Anti-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Museum Tusulanum Press, 2000, pp.24-89.

④ Landon R. Y. Storrs, *The Second Red Scare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New Deal Le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65.

⑤ Michael J. Heale, *McCarthy's Americans: Red Scare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1935-1965*, p.35.

⑥ James Zeigler, *Red Scare Racism and Cold War Black Radicalis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5, p.21.

⑦ Jeff Woods, *Black Struggle, Red Scare: Segregation and Anti-Communism in the South, 1948-1968*,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

同时期民调,提出教育是反共思潮的结构性推动力。^①此外,也有研究认为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民意—政策传导机制易于产生排外性政策。^②这些研究试图找到影响政治压迫的长期社会变量,对于理解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形成机制具有一定帮助,但难以解释为何“恐慌”会在特定时间点集中爆发。

(二) 政治心理学的群体性恐慌研究

心理学理论以“恐慌”中的社会群体为研究重心。部分研究者将“麦卡锡主义”等极端运动归因于社会非理性,^③而非理性源于群体遭受的危机。^④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社会群体相互争夺社会声望(prestige)和被认同感。在两次“恐慌”之前,保守主义者在新思想冲击下声望受损,因而产生强烈排外情绪。^⑤伯特认为,社会中某些群体在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演变中被边缘化,必须将敌意投射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具象化目标上,外来意识形态因而成为其攻击对象。^⑥陈晓律认为由于美国保守主义者对于意识形态入侵格外敏感,反对基于理性主义的革命,往往成为参与反共运动的主要团体。^⑦这种理论能解释部分民众参与“恐慌”的动因,但对于群体运动发展方向解释力有限,也不足以解释同时期的其他社会运动,如引发“恐慌”的左翼运动为何产生。此外,历史上美国的排外运动不局限于反共运动,也包括反移民、反外来宗教和近期的反多元文化运动。心理学理论难以解释为何“恐慌”的烈度、范围和持续时间远大于其他运动,也难以解释同类运动间的差别,如第二次“恐慌”的持续时间和迫害规模大于第一次“恐慌”。总体而言,由于对政治系统关注较少,心理学理论无法呈现反共运动全貌。

(三) 政治社会学的社会运动模型

美国学者对社会运动的一般动力机制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主流理论包括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但这些理论往往基于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之后的美国社会运动,无法直接用于解释反共运动的形成。约翰·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迈耶·扎德(Meyer Zard)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是社会动员

① James A. Davis, "Communism, Conformity, Cohorts, and Categories: American Tolerance in 1954 and 1972-7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1, No.3, 1975, pp.491-513.

② Benjamin I. Page and Robert Y. Shapiro, "Effects of Public Opinion on Public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7, No.1, 1983, pp.175-190.

③ 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Viking, 1895, p.15.

④ Robert K. Murray, *Red Scare: A Study in National Hysteria, 1919-192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5, p.3.

⑤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Vintage, 1965, p.6.

⑥ Andrew Burt, *American Hysteria: The Untold Story of Mass Political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12.

⑦ 陈晓律:《试析英美保守主义的异同》,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第70—78页。

组织(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从成员和立场相似团体中寻找资源的过程,并定义了物质、人力、社会关系、文化和道德五种资源。^① 克雷格·詹金斯(J. Craig Jenkins)认为社会动员组织通过集体行动和对议题的塑造来解决“搭便车”问题。^② 但该理论在解释反共运动时有一定局限性,即预设所有社会运动必然由明确的组织发起。^③ 可是在两次反共运动中,社会自发的、组织度较低的保守思潮先于运动领袖而存在,资源动员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此类现象。

道格拉斯·麦卡丹(Douglas McAdam)的政治过程理论认为,有四个因素决定了社会运动,它们分别是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反叛意识(insurgent consciousness)、社会群体的组织程度和社会控制力。^④ 尼尔·卡伦(Neal Caren)则认为,政治过程包括政治机会、动员结构、建构过程(framing process)、周期性抗议(protest cycle)和争议性剧目(contentious repertoire)五要素。^⑤ 迈克尔·阿马托(Michael Armato)和卡伦认为,政治过程理论强调政治机会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都围绕政治机会进行,政治机会来自政治系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如政治多元化、政府无法压制异见和统治集团分裂等。^⑥ 此外,戴维·梅耶(David S. Meyer)将外来因素(exogenous factors)视作重要的政治机会,会对社会运动起增强或抑制作用,是搭建议题和进行动员的关键。^⑦ 埃德文·阿曼塔(Edwin Amenta)等学者对动员过程进行了更细化的研究,指出不同集体行动策略影响社会运动走向,而动员者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希望动员的群体

①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2, No.6, 1977, pp.1212-1241.

② J. Craig Jenkins,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9, No.1, 1983, pp.527-553.

③ 社会学家提出一些反例模型,例如,克劳沃德—派文策略是一种资源动员理论无法解释的社会动员现象。与社会群体发动的运动不同,它最初表现为弱势群体呼吁政府救济的自发行动,通过形成政府难以接受的巨大财政负担,在政府和低收入人群之间创造矛盾。在反共运动中,民众要求政府加强意识形态审查和加强美苏对抗,严重限制政府外交政策,呈现出克劳沃德—派文策略的一些特点。参见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Collective Protest: A Critique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4, No.4, 1991, pp.435-458;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p.381.

④ Douglas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in David A. Snow, et al., eds.,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2013,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9780470674871.wbespm160>, 访问时间:2020年9月26日。

⑤ 下文将详细讨论争议性剧目的定义。参见 Neal Caren,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in George Ritzer, ed.,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New York: Blackwell, 2006, p.48.

⑥ Michael Armato and Neal Caren, "Mobilizing the Single-Case Study: Doug McAdam's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25, No.1, 2002, pp.93-103.

⑦ David S. Meyer and Suzanne Staggenborg, "Movements, Countermovem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1, No.6, 1996, pp.1628-1660.

类型制定策略。^①

政治过程理论对于当代美国社会运动解释力较强,但并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反共运动:其一,政治机会、建构过程和争议性剧目这三个核心概念的界定太过宽泛。其二,该理论缺乏对特定社会条件如文化和政治规则的研究。其三,该理论的结构较为严谨,但对群体间动态博弈的讨论有限,因此对“争议”这类包含强烈主观判断的概念只能进行较模糊的讨论。反共运动具有一些独特性质,如议题的政治性、全国性和抽象性,建构反共运动的政治过程模型时必须将其纳入考虑。

三 三要素模型与美国反共运动的形成机理

本文在既有社会运动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两次“恐慌”及伴随的反共运动,结合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性质,提出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三要素模型。在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美国反共运动的形成和升级机制可以用以下模型表示(如图1)。本文的核心假说为:(1)美国反共运动是运动领袖通过建构议题吸引运动听众的过程;(2)外来威胁议题、政治领袖和社会听众是构成反共运动的三要素;(3)外部挑战者、政治斗争和潜在听众是美国社会常量,而议题完善度、斗争态势和议题关注度是导致三要素出现的变量;(4)争议性剧目^②是反共运动发展和升级的催化剂。

本文将反共运动视作一种由政客或政党发起以获得选民支持和夺取权力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恐慌”是反共运动的高潮阶段,其标志是反共运动失去社会和政治制衡,反共运动领袖对政敌发动清洗。反共运动可分为社会动员、升级和“恐慌”三个阶段。在动员阶段,政治机会催生运动领袖,运动领袖根据外部挑战者建构议题,议题吸引社会关注并产生听众。在运动升级阶段,运动领袖带领听众反复抗议,扩大议题的影响力和社会参与度。在“恐慌”阶段,运动领袖夺取权力并进行政治清洗,通过排外

^① Edwin Amenta, Neal Caren and Sheera Joy Olasky, “Age for Leisure? Political Medi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Pension Movement on U.S. Old-Age Poli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0, No.3, 2005, pp.516-538.

^② 查尔斯·蒂利认为争议性剧目是“组织为向特定人群提出特定主张而使用的整套工具”,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认为它是“人群知道他们在遭遇不公正社会观点时能够做的行动”。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争议性剧目是与运动主题相关的、能够引发社会关注和辩论的斗争事件,典型事例包括大规模游行、暴力事件和争议性公开言论。参见 Charles Tilly,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17, Issue 2, 1993, pp.253-280; Donatella Della Porta, “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 in David A. Snow, et al., eds.,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2013,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674871.wbepm178>, 访问时间:2020年10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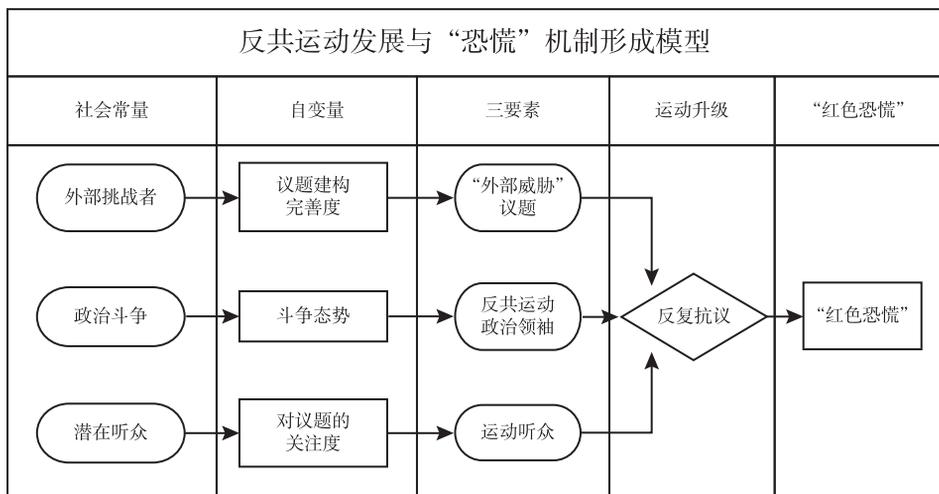


图1 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三要素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政策兑现对听众的承诺。下文对本模型的三要素进行详细讨论,并介绍模型运作机制。

(一) 外部挑战与威胁的建构

外来威胁是反共运动的主要议题,也是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伯特等人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外来宗教、外来移民和秘密结社均成为美国社会排斥的对象,^①日本、德国等多国曾对美国形成外部竞争甚至军事冲突。外部挑战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常量。但外部挑战者只是为运动领袖提供了议题建构素材,必须经过议题建构才成为社会认可的外来威胁。与其他曾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组织和外来思想相比,只有苏联使美国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一方面,苏联扩张对美国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美国政客将国内左翼运动与外部威胁挂钩,夸大了苏联对美国社会的“威胁”。

议题完善度是反共运动的第一个自变量,其核心在于因果链的完整度。反共运动的议题建构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渠道。其一,美苏地缘竞争客观上引起美国社会关

^① Andrew Burt, *American Hysteria: The Untold Story of Mass Political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12.

注,苏联阵营扩张令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变得更加完善、具体和迫切。^①其二,美国社会感受到的“苏联威胁”一定程度上是反共政客建构的产物。作为对比,冷战初期欧洲国家存在直接面对苏联军事入侵的风险,但并未出现类似“麦卡锡主义”的狂热政治迫害,欧洲主流媒体甚至还对麦卡锡团队在欧洲的反共调查大肆嘲讽。^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并未对美国构成显著地缘挑战,却被反共政客建构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手。^③可见政治宣传在塑造威胁方面甚至比地缘政治事实更加重要,是将外部挑战转化为反共运动议题的关键。政治宣传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因果链,将外部挑战者与社会广泛关注的国内安全问题相联系。举例而言,美国政客将危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大罢工归因于苏联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支持,建构出企图颠覆美国生活的苏联形象。反苏因果链的核心在于共产主义思想“入侵”美国,因此反苏政治天然强调意识形态斗争,这是其他外部挑战者未能引发“恐慌”的关键因素。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争议性剧目是与运动主题相关的、能够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的冲突事件,如劳工运动和恐怖袭击。在运动领袖的诱导下,听众将争议性剧目视作外部挑战者危害美国社会的确凿证据,因果链随着争议性剧目的涌现不断完善。随着运动的发展,运动领袖建构出的外来威胁逐步具象化,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议题。

(二) 政治斗争与运动领袖的产生

运动领袖是反共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往往为在任政客,是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没有政客建构议题、组织抗议,美国民间力量很难自发形成全国范围的政治清洗运动。^④美国幅员广阔,社会高度多元化,信息的扩散、政治主张的传播和全国性社会运动的动员都高度依赖媒体宣传;政客就争议性剧目进行的公开演说能够影响全

^① 旧孤立主义是美国 20 世纪之前的主流外交观点,强调避免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纠缠。威尔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规则,富兰克林·罗斯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随着美苏竞争加剧,美国已经无法坚持旧孤立主义原则。参见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New Isolationism,” <https://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politics/foreign/asiso.htm>, 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② Richard H. Rovere, *Senator Joe McCarth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59, pp.199-205.

^③ 例如《华盛顿邮报》指称西雅图罢工为“美国赤化的奠基石”,西雅图市长奥利·汉森极力将劳资矛盾鼓吹为国家和民族危机。参见 Trevor Williams, “Ole Hanson’s Fifteen Minutes of Fame,” <http://depts.washington.edu/labhist/strike/williams.shtml>, 访问时间:2020 年 10 月 10 日。

^④ 例如在“9·11”恐怖袭击后,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立即平息了国内的反穆斯林情绪,声称“恐怖主义不是伊斯兰的真正信仰”。在小布什任内,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造成了安全威胁,中东三股极端势力与美军直接对抗,这些地缘事件都加剧了社会对穆斯林的恐惧。但由于共和党政府和反对党均没有将穆斯林建构为威胁的意愿,美国的反穆斯林运动在小布什任内大部分时间里受到压制。参见 George W. Bush, “Text of George Bush’s Speech,”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1, 2001; Andrew Burt, *American Hysteria: The Untold Story of Mass Political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149.

国民意,进而促进社会运动的全局发展。与此同时,政客往往掌握充足的社会资源,能够有效动员政治主张相近的社会群体,提出明确的运动目标,提升社会群体的组织度,同时打压持反对立场^①的社会群体。

斗争态势是反共运动的第二个自变量。美国社会常年存在参与政治斗争的政客,但政客只有在特定态势下才能成为运动领袖,即反共强硬派在野、温和派执政。这是因为构成反共运动的议题天然具有安全色彩,应对外来威胁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核心职责之一,反对派可通过夸大威胁严重性来攻击政府失职。围绕“恐慌”展开的政治斗争是政客个人行为、政党竞争、部门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合体,有四方面因素会影响斗争的强度:其一,运动领袖个人从“恐慌”中收获资源,其利益可能与党派冲突。例如麦卡锡所属的共和党在1952—1954年执政,但麦卡锡出于自身政治发展考虑,继续将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甚至攻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其二,政党可能出于党争考虑为政客提供支持,并为目标一致的政客协同作业提供平台,但其利益可能与政客个人冲突。其三,情报部门出于自身利益鼓吹外来威胁,侧面支持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如胡佛在两次“恐慌”中均参与了针对左翼人士的审查和迫害。其四,意识形态斗争影响政客在政策路线之争中的立场,例如民主党保守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持共和党对本党进步派的清算。从20世纪的“恐慌”案例来看,反共运动领袖往往在“保守派在野、(对外)温和派执政”的政治态势中崛起,但领袖发动反共运动仍然需要配套的议题建构与社会动员。

争议性剧目尤其是部分官员的“不忠诚”表现可能成为扭转斗争态势的关键,为在野政客尤其是具有监督权的反对党议员提供夺权机会。这种现象在第二次“恐慌”前的反共运动中尤其明显,罗斯福政府官员谢伟思(John S. Service)被卷入“美亚事件”引发了保守派对罗斯福支持者的清算。

(三) 社会对议题的关注度与听众的产生

运动听众是参与社会运动、提升政客支持率的人力资源,是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社会没有对运动领袖的反共言论积极响应,反共运动的规模将受到巨大限制,运动领袖也缺乏维持运动的资源。而一旦反共政客通过建构议题动员足够数量的听众,执政者将在选举压力下被迫采取与运动领袖相近的反共立场,从而形成在野党和执政党在反共言论和政策上的“军备竞赛”,最终导致反共运动上升为“恐慌”。

社会对议题的关注度是反共运动的第三个变量,争议性剧目使社会对外来威胁议

^① 反共运动的打压对象既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也包括反对政治迫害的人权活动人士、主张对苏联采取温和政策的政治人士等。

题的关注上升。如果社会缺乏一项尖锐急迫的主要矛盾,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关注点多元且分散,无法形成具有明确诉求的运动,也不大可能对政客的呼吁进行有效响应。社会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会优先关注外来威胁而忽略其他矛盾,产生反共运动的听众;争议性剧目正是吸引社会关注的关键事件,它往往对美国社会生活带来冲击,令民众直观地感受到外来威胁,尤其是外来价值观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威胁。历史上的两次“恐慌”都发生在美国社会多重矛盾并发的时期,大规模工人运动使得工人阶级与城市中产阶级的矛盾格外突出,引发美国社会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仇视。

(四) 周期性抗议与运动发展

卡伦提出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概念“周期性抗议”,认为社会运动的发展可能需要经历若干周期,而非阶段明确的线性发展。^① 议题建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员三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运动领袖发起的周期性抗议活动中反复强化。具体而言,运动领袖将社会内部问题与国际关系相结合形成因果链,将社会矛盾转化为美国价值观和外来意识形态的矛盾,使保守派群体通过政治参与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此同时,运动领袖将内外矛盾与政敌的施政失败挂钩,煽动听众支持自己、反对政敌,达到夺取政治权力的目的。外部挑战者与外来威胁之间的因果链也需要不断完善,随着争议性剧目不断涌现,运动领袖建构的因果链愈发完善,更多民众接受运动领袖的“反共”逻辑,成为运动的听众和参与者。随着周期性抗议获得更大社会影响,更多的政客和民众参与其中,使运动不断升级。例如帕默和麦卡锡都是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登上政治舞台的。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共思潮兴起的同时,劳工运动和其他左翼运动也随之兴起,试图以阶级斗争叙事动员社会群众。但相比之下,反共运动拥有四项左翼运动不具有的优势,往往能争取到更多听众。首先是议题关注度,由于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更加担忧劳工运动对美国社会生活的破坏,这些群众更加关注“共产主义威胁”而非劳工所受到的压迫。其次,右翼政客的政治资源远比左翼活动家雄厚。再次,苏联影响力扩大客观上加深了美国社会对“苏联威胁论”的认知。最后,左右翼暴力冲突为反共运动领袖提供了建构议题的素材,在运动领袖诱导下,美国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反共运动听众。

一旦运动领袖在事实上失去制衡,反共运动即升级为“恐慌”,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运动领袖得到社会高度支持,短期内收获极高的个人声望。第二,运动领袖凭借新收获的政治资源批判执政者,限制执政者的政策选项,实际上夺取政府决策权。

^① Neal Caren,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p.48.

第三,运动领袖失去制衡,能够违反言论自由、公民司法权利等政治规则,对反对者进行清算。第四,运动领袖兑现对保守派听众的政策承诺,推出更加强硬的排外政策,默许甚至鼓励民间自发的排外行为。第五,“反共”成为社会和政坛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反对者不愿与运动领袖公开斗争,“恐慌”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因而带有一定惯性。

然而一旦三要素不复存在,反共运动将走向衰落。三要素的消失分为三种情景:首先是外部挑战者因国力衰退、国际关系变化等原因不再构成威胁,国内矛盾与挑战者的因果链断裂,反共运动的议题建构将缺乏基础。其次是政治斗争形势变化,当运动领袖夺权上位,其践踏法律和政治规则的行为将遭到政敌的集中攻击。最后是社会听众的流失。社会矛盾的平息导致民众政策诉求多元化,减少了群众参与极端社会运动的意愿。与此同时,长期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对抗会消耗听众对议题的关注,领袖难以持续对听众进行动员。上述因素可能引发美国社会对于领袖滥用权力的反感,导致反共运动无以为继。

四 案例检验与分析

美国在20世纪出现的两次反共运动存在多方面共性,经济动荡、工人运动、保守派反扑和一系列冲突事件对社会进行反共动员。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内政外交需求明显有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更加明确的地缘和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环境差异也在两次运动的议题建构中有直接体现。但总体而言,两次运动均可用三要素模型进行分析。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共运动的泛起与消解

1. 反共运动三要素分析

第一次“恐慌”之前,美国社会正在形成反共运动的三个要素。第一,社会对意识形态斗争关注度较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政府放弃美国多年秉承的孤立主义原则,派遣军队参与欧洲诸国的大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大流感带来空前的美军伤亡,美国社会充斥着强烈的排外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经济领域的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其次是士兵回国引起的社会动荡,大量士兵在缺乏安置和救济计划的情况下复员;再次是黑人、妇女在战时地位提高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冲击;最后是保守派的排外主义情绪。俄国移民群体成为美国社会反共和反移民情绪的主要攻击目标,种族主义者、仇俄人士和禁酒主义者很快形成一个坚定的反共阵营。

第二,“苏联威胁”借劳工运动逐步建构成形。在苏联共产主义革命的鼓舞下,美国的工人运动快速发展,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类左翼运动与布尔什维克积极呼应,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形成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工人组织受到苏联革命鼓舞,对美国革命前景产生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其斗争方式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较强的反共情绪。威尔逊政府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法律,包括1917年《间谍法》、1918年《煽动法》《移民法》等,这些原先被用来审查亲德反战言论的机构很快被用于反共,但美国在野党和保守派民众仍指责威尔逊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

第三,政客抓住政治机会。威尔逊在国内的政治基本盘并不稳固,他在1912年的当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与共和党分裂;^①1916年他与共和党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得到的选票数非常接近,凭借进步派和劳工的支持才成功连任。威尔逊倡导的国际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到国内批评,孤立主义在美国社会重现,为保守派政客创造了夺取权力的机会。由于威尔逊应对老兵复员等工作不力,美国社会发生动荡,劳工和美国中产阶级爆发激烈冲突,威尔逊已经失去继续争取连任的实力。在1920年选举临近、中央权力出现松动的情况下,多名政客开始以反共为手段吸引选民。

2.运动的发展与升级

1919年1月,西雅图劳工中央委员会展开美国史上第一次城市总罢工,将近20%的市民参与其中,城市服务停摆。西雅图罢工是第一次“恐慌”的首个争议性剧目,工人瘫痪城市的能力令美国中产阶级如临大敌。^②1919年年初,参议员李·奥瓦曼(Lee Overman)率先展开针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调查,多名国会议员随后跟进。1919年劳动节前夕发生连环炸弹袭击,劳动节当天,工人与保守派所谓“爱国者”团体的冲突加剧了紧张局势。司法部部长帕默试图以“支持和平游行”的中立言论息事宁人,但遭到国会和保守派社会群体的“通共”指责。6月2日,帕默的住宅也遭到未遂炸弹袭击;司法部随即展开报复,由胡佛领导的情报部门准备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大规模排查和驱逐出境。在帕默住宅遭袭后的几个月里,帕默和胡佛都在为大规模搜捕做物质和社会舆论准备,1919年9月波士顿警察罢工等劳资冲突加剧了社会上的反

^① 进步党又称“公驼鹿党”,是西奥多·罗斯福在1912年输掉共和党初选后建立的政党,其主要政策主张是社会改革和对部分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罗斯福和希拉姆·约翰逊合作参与竞选,造成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失利。

^② Ole Hanson, *Americanism Versus Bolshevis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20, pp.vii-viii.

共呼声。^①

获得民意支持的帕默在1919年11月初对美国的20多个所谓“共产主义组织”进行大规模搜查,其主要目标是并不激进的俄国工人工会(Union of Russian Workers),其余一些被审查组织也不过是俄国移民俱乐部。纽约等地开始大规模搜捕俄裔移民,许多美国公民和471家“激进媒体”也成为搜查对象,政治清洗逐渐失控。1920年1月2日,胡佛的探员在30多个城市对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搜查,造成大量不公正调查和迫害。但帕默由此获得了美国国会和选民的高度支持,其违反《权利法案》的政策并未遭到违宪质疑。在高社会支持率的鼓舞下,帕默着手大规模遣返俄国移民,试图利用高曝光度和支持率捞取参加1920年总统选举的政治资本。

然而由于帕默在短时间内采取大规模、强有力的反共手段镇压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快速平息。美国社会感知到的外部威胁不复存在,“苏联威胁美国”的因果链无法维系。1920年劳动节前夕,帕默大幅渲染劳工恐怖主义,并出动大量军警;但节日当天并未出现暴力游行,帕默开始遭到蓄意夸大共产主义威胁的质疑。曾反对司法滥权、阻止大量遣返令的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斯·珀斯特(Louis Post)在1920年5月7日公开作证时当众攻击帕默,随后一些法律和政界人士也开始谴责帕默违宪,帕默的高支持率开始瓦解。即便该年9月发生华尔街炸弹袭击,激进暴力已经不足以引起大规模公众恐慌,劳工组织也不再采取该策略进行抗争。^② 美国的反共运动告一段落。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运动的泛起与消解

1.反共运动三要素分析

第二次“恐慌”之前,美国社会同样形成反共运动的三个要素:第一,社会对苏联警惕性较高。应该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感受到的“苏联威胁”很大程度上来自地缘竞争本身,但美国社会的三个因素为反共议题的建构创造了基础。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使美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主流主持意识形态对抗。其次,劳资冲突再次加剧。1945年11月,美国国会中止战时价格管控,导致200万工人下岗,工人阶级实际收入大幅减少,工会运动此起彼伏,从1945年8月到1946年8月,美国共发生暴动4630起,其中1946年上半年被劳工统计局定性为史上最密集的罢工潮,共有297万余人参加罢工。^③ 大规模工会运动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苏联意识形态

① Robert K. Murray, *Red Scare: A Study in National Hysteria, 1919-1920*, p.57.

② Robert K. Murray, *Red Scare: A Study in National Hysteria, 1919-1920*, p.122.

③ Joel Seidman, *American Labor from Defense to Reconver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109-121.

渗透的担忧。

第二,“苏联威胁”议题因间谍案和苏联扩张逐步完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对美国构成了更为显著的挑战。首先是地缘竞争,由于共产主义阵营的影响力在欧亚大陆快速扩张,美国政界无法回避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杜鲁门政府于1947年提出“杜鲁门主义”,主张对苏联进行遏制,此举将美国社会对“苏联威胁”的关注推向新高度。由于中国国民党在1949年败退台湾,美国国内社会因“失去中国”感到恐慌,社会主流观点认为苏联“操纵”了中国共产党和杜鲁门政府。^①执政的民主党人希望单独解决“苏联威胁”,以在国内舆论战中挽回颜面,^②但仍成为党内保守势力和共和党政敌的攻击对象。其次,苏联间谍活动取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炸弹袭击,成为建构外来威胁的主要素材。1945年的《美亚》(Amerasia)杂志社搜查开启了美国对苏联间谍活动的审查。1948年,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大卫·惠特克·钱伯斯(David Whittaker Chambers)这两名苏联间谍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接受听证,指称大批政府雇员通共,社会对“苏联威胁”的关注空前高涨。政府的反共政策、反对党政客对政府“通共”的指控和社会对“苏联渗透”的恐慌相互激化,导致国内政治迫害不断升级。

第三,政客抓住政治机会。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20世纪30年代以来长期执政,其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扩大联邦政府的政策诉求和多年政治斗争都为新政民主党树立了不少敌人。美国的部分政客从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担忧中看到了争权夺利的机会,开始建构“苏联渗透”议题,以期从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手中夺权。两党内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保守派议员建立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其成员将反共运动视作攻击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官员的机会。

2. 运动的发展与升级

1945年联邦调查局和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对《美亚》杂志社的“间谍活动”进行调查,相关审讯大多因为程序不正义和缺乏确切证据而不了了之,但引起社会恐慌,罗斯福政府的中国事务外交官谢伟思遭到指控。1948年本特利、钱伯斯声称几位政府雇员参与间谍活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根据钱伯斯的指控,审讯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的助理、曾参与联合国创建的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并于1949年年底宣判希斯有罪,受到鼓舞的保守派开始大举攻击新政民主党人。参议员

^① 琳·乔伊纳著,张大川译:《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② Andrew Burt, *American Hysteria: The Untold Story of Mass Political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118.

麦卡锡将反共运动视作政治机会,他于1950年2月9日在惠灵演讲时声称自己握有205名间谍的名单,引起轩然大波;2月20日,麦卡锡在参议院作证时宣称还有81名“忠诚可疑”人员的名单。麦卡锡利用“失去中国”给美国社会造成的恐慌,指控希斯的上司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通共;随后麦卡锡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反共情绪抨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立战功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其支持率在争议中攀升。到1952年,麦卡锡的声望如日中天,民主党担心对抗麦卡锡会遭受舆论反噬,共和党则害怕与其分割会激怒选民,并希望通过麦卡锡打击新政民主党人。

1952年共和党赢得总统大选后,共和党支持麦卡锡的动机有所弱化,并试图约束麦卡锡的疯狂指控。但麦卡锡凭借高声望继续推动反共清洗,与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组建调查小组委员会,其支持率在1952—1953年日益高涨。执政的共和党无法对麦卡锡进行有效制衡,麦卡锡甚至敢于在1953年攻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科恩等人甚至远赴欧洲,对当地左翼运动进行调查。

然而随着麦卡锡委员会对美国陆军展开反共调查,尤其是科恩在委员会助手戴维·施尼(David Schine)到陆军服役期间以权谋私,麦卡锡委员会很快与陆军相互提出指控。麦卡锡开始遭遇公关危机,共和党以此为契机与麦卡锡划清界限。1953年3月9日,共和党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Ralph Flanders)公开谴责麦卡锡分裂本党;4月22日,麦卡锡委员会举行对陆军的公开调查听证;6月9日听证会中,麦卡锡打破双方默契,指控军方律师约瑟夫·奈·韦尔奇(Joseph Nye Welch)的雇员弗雷德·费希尔(Fred Fisher)有通共嫌疑。这种歇斯底里的人身攻击令美国公众厌恶。听证会后,麦卡锡的公众支持随即每况愈下。1953年12月2日,麦卡锡遭到参议院谴责,其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三) 美国两次反共运动的共性

美国两次反共运动的背景差异较大,但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基本符合三要素模型。

第一,美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为反共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促进了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一系列短期国内问题在战后短期内集中爆发,给美国社会的部分群体尤其是保守派群体带来强烈不安全感。由于劳工运动与苏联天然具有密切联系,美国社会对意识形态入侵高度关注,催生大量反共运动听众。劳工运动也为美国反共政客提供建构“苏联威胁”的素材。

第二,部分政客抓住了有利斗争态势,成为反共运动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共运动中,领导反共调查的奥瓦曼等人属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中的保守派,扩大反

共搜捕的司法部部长帕默则希望竞选总统,他们都希望从威尔逊政府夺取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共运动带有更强的针对性,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成员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保守派政客;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卡尔·蒙特(Karl Mundt)等共和党议员利用该平台对多名新民主党政客进行听证和攻击。麦卡锡被共和党视作赢得1952年选举的政治武器,但在选举结束后又脱离该党掌控,利用方兴未艾的反共思潮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

第三,争议性剧目是社会运动升级的必要条件。第一次出现意识形态恐惧而“反共”的背景是西雅图全市罢工,这是美国首次出现城市服务瘫痪,对美国城市居民造成巨大心理冲击。1919年4月,邮局发现共有36位美国政界要员成为邮件炸弹的袭击对象,而袭击时间定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类新闻对民众的反劳工情绪产生巨大影响。由于汉森和帕默等人也成为炸弹袭击受害人,受到民众同情,他们推动的政治清算给政客本人带来了短期的极高支持率。第二次出现意识形态恐惧而“反共”则是三种内外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即罢工潮、以“失去中国”为代表的苏联阵营扩张和苏联间谍案。其中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本特利和钱伯斯的听证对于事态升级的影响尤其重大,由于两人公开指认政府官员,舆论宣传和政治斗争两条动员路径发生重合,尼克松对希斯的指控为麦卡锡的大规模清算开启了先例。没有这些争议性剧目,社会对抽象的“苏联威胁”缺乏第一手了解,政客无法完成对排外主义议题的建构。争议性剧目的反复出现则向社会直观展现了斗争的升级,有助于政客将局部矛盾包装为苏联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威胁。

在运动升级的过程中,政客个人声望和说服能力直接影响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的效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共运动的操盘手帕默是贵格教徒,自称“有原则的和平主义者”,在“恐慌”前以温和派形象积累了很高声望。由于帕默是炸弹袭击的受害人,且在发起迫害前数月时间里保持政策与言论克制,社会对其逐步升级的反共清算表示理解与支持,较少对其侵犯言论自由与践踏嫌犯司法权利的做法进行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反共政客则体现出不同的动员风格,在公开听证中采取“疯狗式”策略,频繁发出证据不足的指控污蔑,并通过“通共名单”吸引眼球。虽然麦卡锡声名不佳,甚至被参议员普遍视作骗子,^①他却成功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抹黑谢伟思等民主党政府官员,导致民主党人人自危,惧怕与麦卡锡公开交锋。可以说麦卡锡的谎言和诽谤本身就是反共运动中的争议性剧目,它吸引了公

^① Andrew Burt, *American Hysteria: The Untold Story of Mass Political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129.

众对反共运动的关注,并调动了社会的反共热情。正如当时一名美国选民所说:“他是我们的一员,麦卡锡反共,我们都反共。”^①随着电视技术开始应用于美国政治,麦卡锡以后的政客必须使用冲击力更强的言论快速吸引观众,而不能像帕默时代那样静待舆论发酵。近十年鼓吹排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美国政客在言论风格上更加接近麦卡锡而非帕默,麦卡锡式宣传风格有可能成为信息爆炸时代政客进行社会动员的首选。

第四,在反共运动的衰落期,反对运动领袖滥用政治审查权批评者出现。与此同时,由于三要素消失,运动领袖无法通过建构议题吸引听众。在两次反共运动后期,苏联这一外来挑战仍然存在,但以劳工冲突为代表的国内社会矛盾有所下降,政治斗争的模式也由运动领袖夺取权力变成运动领袖维护权柄。在这种情况下,运动领袖的政敌有可能对其进行批判,以争夺政治权力。在“恐慌”期间,帕默和麦卡锡两位核心人物的政治迫害同社会听众支持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循环,因此反共运动在高潮期具有一定政治惯性。但随着运动领袖的政敌反复对其进行批判,不利于运动领袖的争议性剧目在运动衰落期出现,即帕默与珀斯特的辩论、麦卡锡与韦尔奇的辩论。运动领袖因争议性剧目而声名狼藉,不再能够吸引足够听众,反共运动也无以为继。

在反共运动达到“恐慌”后,以劳工为代表的被迫害者进行反抗可能令运动升级。事实上,被迫害者也无力进行系统性反抗,但其他反对斗争运动的个人和团体可能从社会中涌现,领导对运动领袖的反击。与帕默对抗的珀斯特曾遭到反共情报机构审查,但被情报部门证明没有“通共”嫌疑。与麦卡锡对抗的陆军则在美国社会拥有较高声望,律师韦尔奇个人则是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社会同情。这些新政敌与运动领袖在反共运动中打倒的旧政敌不同,在意识形态上的弱点较小,因而能够令意识形态斗争的烈度降低直至平息。

五 三要素模型下的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斗争

中美关系在小布什任期结束后开始恶化,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受到的质疑与日俱增。^②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制定了一系列加强意识形态对抗的政策,对华战略

^① Andrew Burt, *American Hysteria: The Untold Story of Mass Political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138.

^② Wang Jisi, “Assessing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1, No.2, 2019, pp.195-204.

的对抗性迅速增强。以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为代表的反华政客提出两方面诉求:一方面以“间谍活动”为由审查和驱逐中国在美机构、企业与个人,另一方面以“中国威胁”为由打击对华“软弱”的政敌,吸引关注“中国威胁”的选民群体。上述两点目标基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卡锡的政治主张重合,因此蓬佩奥等人力推的反华政治引发中美学者关注。

美国当前反华政治是否会升级为“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美国权力更替将如何影响美国国内的反华政治走向?本文采用三要素模型分析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得出以下结论:在特朗普任期内,反华政治的因果链建构、政治斗争态势和争议性剧目均存在一定缺陷,反华运动进展相对缓慢。但在民主党执政后,美国反华政治升级为“恐慌”的可能性较大。

(一) 特朗普时代反华政治未能升级为“恐慌”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反华政治并未升级为“恐慌”,主要原因包括三点:第一,从政治斗争态势来看,共和党政客将攻击中国当作推卸责任和打击民主党政敌的手段。^①但在特朗普任期内,共和党执政、民主党在野的斗争态势不利于反华政客发动社会群众。在这种态势下,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对华“软弱”,但民主党的外交主张并未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民主党的所谓“通中嫌疑”对美国社会并未构成严重威胁。在野的民主党为了夺取权力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批判,其批判焦点则集中在美国国内议题和司法争议上,分散了对中国议题的关注度。

第二,从议题建构角度来看,美国反华政客建构的“中国威胁”并不完善,缺乏争议性剧目的支撑。美国自奥巴马以来频繁指责中国“咄咄逼人(assertive)”地展现所谓“锐实力(sharp power)”,并将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视作外部挑战。^②自2017年起,《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开始将中国建构为美国的“首要安全威胁”。但由于美国社会对国际议题关注度有限,中美在中国沿海、第三国和国际组织的地缘竞争难以传导为社会民众能够亲身体会的“中国威胁”。由于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既未直接对美国社会生活造成破坏,也未参与美国社会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种族和党派等冲突。与之相反,由于中美两国当前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美国社会从对华贸易交流中直接受益,部分民众对中国国情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些群体对于反华

^① Alex Isenstadt, “GOP Memo Urges Anti-China Assault over Coronavirus,” Politico, April 4,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4/24/gop-memo-anti-china-coronavirus-207244>, 访问时间:2020年9月23日。

^② Joseph S. Nye, “China’s Soft and Sharp Power,” China-US Focus, January 5, 2018, <https://www.chinausfocus.com/society-culture/chinas-soft-and-sharp-power->, 访问时间:2020年11月23日。

政客捏造“中国威胁论”起到一定的“祛昧”作用。

第三,从社会矛盾角度来看,美国社会政策焦点高度多元化,重视“中国威胁”的听众数量有限,对反共运动总体并不积极。根据《财富》杂志2020年7月的调查,在两党和中间派选民中,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只有最低的1%—2%,远低于种族、移民和枪支管制等话题。^①因此虽然近年来中国在两党选民中的评价普遍恶化,大多数选民尚不认为“中国威胁”是最急迫的议题,在对抗中国的政策偏好上也存在较大分歧。由于中间派选民和左翼选民对外来威胁关注度不高,民主党政客没有动机附和共和党反华政客,渲染“中国威胁”。对于民主党政客而言,附和“中国威胁论”可能被少数族裔选民指责为种族主义,具有一定政治风险;相反,借“种族歧视”“推诿责任”批判共和党政客的政治收益较高。分裂的民意避免了形成两党反华言论的“军备竞赛”。

(二)拜登执政加剧“恐慌”的风险

拜登就职后,被认为在中美外交中态度更加理性务实的民主党掌握联邦行政与立法权,但美国社会的反共运动升级风险反而增加。执政权更替造成的斗争态势变化是风险上升的主因,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也促成反共运动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

第一,从运动领袖角度而言,保守派在野、进步(温和)派执政的斗争态势更容易出现反华运动领袖。由于民主党同时控制总统席位和国会两院多数,^②共和党至少在拜登执政前两年内失去对民主党施政的制衡能力,难以对美国内政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可能将外交作为突破口,效仿麦卡锡参议员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利用两院立法委员会监督权和公众影响力^③批判执政党对外绥靖。与此同时,拜登在上台之前就强调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④号称要举行所谓“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此举可能与共和党反华反共人士不谋而合。为了维护自身执政合法

^① Nicole Goodkind, “The Economy Is No Longer Americans Top Concern Heading into the 2020 Election,” *Fortune*, July 30, 2020, <https://fortune.com/2020/07/30/coronavirus-us-economy-election-issue-gdp-trump-biden-covid-19/>, 访问时间:2020年9月23日。

^② 参议院两党席位相同且表决出现平局时,平时不具备投票资格的、隶属民主党的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可参与投票,故民主党掌握参议院的所谓“半票多数”。

^③ 委员会是国会立法过程中的重要机构,通常由对某个领域积累了专业知识的“专家”议员参加。在美国立法程序中,法案在表决之前必须交由委员会磋商、审议和修改,两院均有此程序,因此委员会对本领域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委员会也具有召开听证、传唤人员和索取文件的监督权,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即是利用这种权力进行审查。

^④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p.64-76.

性,争取共和党政客的支持,拜登政府可能主动强调中美对抗,因而陷入与共和党的反华“军备竞赛”。例如,国务卿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在接受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质询时承诺,将在中国等议题上支持共和党的强硬主张。^① 这种现象在两次反共运动期间都曾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政府的《间谍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鲁门政府的“杜鲁门主义”都是温和派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展开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形成两党“军备竞赛”的实例。除此以外,冷战时期的民主党总统,如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也曾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压力下采取强硬外交方略,致使美国陷入外部斗争。拜登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在野反共政客,但仍被指责“不够强硬”,被迫升级中美对抗,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从议题建构角度而言,随着中美斗争持续并升级,反共运动领袖建构出的“中国威胁”这一概念日益趋于完备。在拜登任期内,美国反华运动领袖将从至少三条因果链建构“中国威胁”:一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威胁”,即“偷走美国的工作”;二是中国交流人员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三是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除上述反华宣传外,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所揭示的,地缘竞争为议题建构提供素材。当前中国周边存在多个热点区域,其中部分区域如南海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意义重大。如果这些区域爆发武装冲突,可能将吸引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中国”在美国引发激烈政策辩论,最终导致共和党对新政民主党外交官员展开迫害。与之类似,一旦未来美国无法防卫其亚太盟友,美国政坛可能出现对执政党的政治清算,社会也将应激产生排华运动。

第三,从听众角度而言,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观感不断攀升,“中国威胁”议题将日益受到美国社会重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一个争议性剧目,可能成为导致更多民众参与反华反共运动的导火索。共和党将席卷美国、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建构为中国对美国的“生化攻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政客多次在国际场合宣扬“中国有罪论”。^② 此外,部分民间团体向中国政府发起

^① Maegan Vazquez, “Key Takeaways from the First Confirmation Hearings for Biden Nominees,” CNN Politics, January 19,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1/19/politics/biden-confirmation-hearings-key-takeaways/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1年1月21日。

^② 所谓“中国有罪论”,宣称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进而要求中国对病毒的扩散进行赔偿。持此论调的政客经常公开使用带有污名化色彩的名称称呼新冠病毒,例如 Alex Ward, “Trump at the UN: America Is Good, China Is Bad,” Vox, September 22, 2020, <https://www.vox.com/world/2020/9/22/21450727/trump-unga-speech-2020-full-text-china>, 访问时间:2020年9月24日。

“追责诉讼”,^①与政客言论遥相呼应。疫情导致更多美国民众仇视亚裔,并成为反华反共运动的听众和参与者。^②

拜登上台后立即运用行政令推翻特朗普的多项政策,^③其就职演说也以美国内部矛盾为重点,^④这说明拜登政府可能优先解决民主党选民更加关心的公共卫生和移民等国内议题,对外则致力于参与国际组织与谈判,维护现有全球治理秩序。上述方针总体有利于避免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升级。但如果疫情继续蔓延,经济不见好转,“中国有罪论”继续传播,美国社会内部贫富和种族等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剧的矛盾可能被统一转化为中美矛盾。而在外交领域,美国难以付出大量资源推动与盟友的合作,因而可能以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作为对盟友外交的突破点,这将加剧美国及其盟友内部的反华思潮。综上所述,随着中美竞争在可见的未来持续并激化,美国国内反华情绪将高居不下,仍有较大可能爆发“恐慌”式意识形态斗争。

六 结论

美国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国家,其历史上出现的两次“红色恐慌”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代表。本文根据政治过程理论和其他现有研究分析“恐慌”,即美国政府和社会在外来意识形态威胁下推行的排外运动和政治迫害。本文研究围绕“恐慌”出现的反共运动的发展全程,针对意识形态斗争的一般动力机制提出三要素理论。该理论将反共运动视为运动领袖为夺取政治权力而发起、通过议题建构动员社会听众的过程,强调斗争态势、议题完善度和社会关注度对运动的重要性。美国反共运动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个被建构出的外在假想敌,假想敌通过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威胁美国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因果链经过政客宣传得到了美国社会多数人的认可。以麦卡锡为代表的运动领袖煽动社会对外来威胁的恐惧,攻击现任政府失职,从而争夺政治权力。政客争议性言论和传播广泛的恶性事件构成争议性剧目,是

① 例如 Nick Allen, “US Firms Launch Legal Action Seek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Damages from China over Coronavirus,” *Telegraph*, March 20, 2020.

② Gabriela Schulte, “Poll: Voters Views on China Have Soured Amid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Hill*, May 14, 2020.

③ Brooke Sigman, “Biden to Sign 17 Executive Actions, Orders to Reverse Trump Policies, Restore Obama-Era Programs on First Day,” *Fox News*, January 20, 2020,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biden-to-sign-17-executive-actions-on-first-day-in-office-reversing-trump-policies-restoring-obama-programs>, 访问时间:2021年1月6日。

④ Joseph R. Biden, “Joe Biden’s Inauguration Speech, Annotated,”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 2020.

恐慌升级的必要条件。

美国历史上两次“恐慌”均针对苏联共产主义,但本文提出的三要素模型也可用于分析当前美国的反华社会动员。右翼共和党反华政客试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打击政敌,巩固本党对美国政治权力的掌握,其反华政治具有向两次“恐慌”特别是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发展的危险。然而当前美国社会党争激烈,社会关注点严重分化,同时由于中国并未对美国社会构成实质性的安全“威胁”,中国议题受到的社会关注度远低于国内议题。由于缺乏愿意参与反共运动的听众,特朗普时代的反华政治未能升级为“恐慌”。

民主党夺取总统席位和两院多数后,美国反华运动升级风险不降反增。中美两国从长期来看在地缘、科技、金融和国际制度等领域均存在难以避免的竞争,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决定了中国仍将长期被视作美国的外来挑战者,也将不断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反华政客提供新证据。虽然反华政客在特朗普任期内未能动员足够听众,其反华宣传却加深了美国社会对华负面印象。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在野的共和党将通过批判政府对华软弱,削弱拜登的民意支持。反华运动领袖仍将积极建构“中国威胁”,通过煽动反华情绪误导民意,通过反复抗议和争议性剧目夺取政治权力。美国的反华政策不会因为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人员更替而停止。

鉴于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对意识形态“恐慌”而导致的重大影响(如严重干扰美国外交政策选择),中国对此应当予以重视,采取措施让中美外交关系不要偏离正常轨道。对此,中国要继续维护与美国温和派人士的沟通机制,加强双边风险管控。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合作,避免美国社会爆发大规模反华情绪的蔓延。在特朗普时代,复杂的社会矛盾淡化了“中国威胁”议题,激进反华运动政客和听众在美国并不占主流。但随着政治斗争态势变化,美国反华政治可能上升为两党和全社会范围的“中国恐惧症”。中美双方都要未雨绸缪,避免类似美苏竞争中意识形态恐惧绑架美国外交决策,进而导致大国冲突升级的悲剧发生。

(截稿:2021年1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